

闪耀在“戟锋”上的精神光源

■本报记者 奉云鹤

强军文化观察

“时代楷模”王戟有着很高的辨识度——军装、轮椅与笑容。学习王戟的事迹，我们真切感受到他军装下的赤子心、轮椅困不住的报国志和笑容背后打不垮的意志力量。

这是王戟身上鲜明的精神品格，也是一代代国防科研先锋的精神缩影。当我们把目光向更深处回望，就会感到，王戟的出现并非偶然。历经岁月沉淀的科研文化，厚重而璀璨，孕育着一批又一批在国防科研战线上冲锋的勇士。

戟者，矛与戈的合体。那束闪耀在“戟锋”上的精神光源，标定了王戟的人生，也为后来者立起了精神参照。

有人问王戟：“身体都成这样了，为什么还在坚守岗位？”王戟的回答很朴素：“我很难说一句理由，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如此吧。”

这样的回答，让人不禁想起数十年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彭桓武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回国不需要理由，不回国才需要理由！学成归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……”

“应该如此”“应该做的”，两句如出一辙的回答，背后是同样的家国情怀。

1999年9月，国庆50周年前夕，23位科学家被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，其中有19人曾在世界名校留学，2人曾在国外科研机构开展科学研究。回国前，他们已然站在了世界学术的前沿，却毅然放弃优渥条件，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。

在那次表彰大会召开的前一年，“连名字都贡献了”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，与世长辞。生前，他在长达17年的岁月里，断绝一切外部联系，化名“王京”。一年除夕夜，邓稼先来到“王京”的帐篷，交谈中握着对方的手说：“老师，叫了您十几年的王京同志，今夜就让我再叫您一声王淦昌老师吧。”言罢，两位科学家顿时泪流满面。

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郭永怀，同样没能亲自领受那枚闪耀的奖章。1968年12月5日，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坠毁。事发后，人们发现郭永怀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，几乎无法辨认，但两人身体中间装有核聚变研究资料的公文包却完好无损。正是依据这份重要资料，在他牺牲的22天后，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爆成功。

空难降临，生死就在一瞬间。郭永怀做出这样的壮举，是本能之下的抉择。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相连时，所付出的一切是那

样自然而然、那么义无反顾。

“两弹一星”的荣耀深深镌刻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历史长河中。该校前身——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，曾在国内率先创办导弹、原子工程系，为“两弹一星”事业输送大批人才。前辈们“以身许国”的铮铮誓言，至今仍在校园里回响，凝成一束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，化作一茬茬学子的价值追求。

为什么要坚持？王戟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，但无需多言。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原研究员唐玉华说：“做的事情对国家是有贡献的，所以他就坚持做下来了。”

每到夜晚，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楼宇上的“银河”二字，总会如约亮起。灯火澄澈，静静照亮一方科研热土，也默默见证着一场跨越岁月的精神接力。

“做‘卡脖子’的攻坚者”。这是王戟对学生提出的要求，也是他从前辈们的躬身实践中悟得的科研信条。

“银河”巨型机横空出世之前，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研究者们，走过了漫长的黑夜。

计算机专家卢锡城，作为亲历者，曾回忆一段屈辱的历史：当年，我国花巨资从国外购进一台高性能计算机，对方提出苛刻条件，要给计算机建造一个“安全区”，中国人无权靠近这个用人民的血汗钱换来的设备。

仰人鼻息的被动，深深刺痛了科技工作者的民族自尊心。他们高声喊道：“丢掉幻想，自力更生！”

1978年5月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将研制巨型计算机的任务交给国防科大。时任该校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的慈云桂，向上级立下军令状：每秒一亿次一次不少，5年时间一天不拖。“就算是豁出这条老命，也要把中国的巨型机搞出来！”图纸靠铅笔画，画错了重新来，几千张图纸画完，他们的眼睛熬得通红；全机底板2.5万条信号线、15万个绕接点，他们跪在地上一条一条接、一个一个绕，不少人腰部落下病根……

42岁的蹇贤福、41岁的王育民、40岁的张树生、36岁的俞牛龙……许多年轻的生命早早燃尽，永远留在了“银河”攻关的征途中。

1983年，慈云桂与他的团队如期完成艰巨的使命。1984年10月1日，在国庆35周年阅兵后的游行中，“银河-1”巨型机模型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。

震天的欢呼声漫过长安街，定格成一代人滚烫的集体记忆，也刻进踏入大学校园不久的王戟心里。

一个国家、民族和军队，总是需要

一群开路的人，如当年在腊子口只身攀爬悬崖绝壁的“云贵川”，如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强渡大渡河的“十七勇士”……

王戟也是开路的人。开路者总是怀揣“粉身碎骨浑不怕”的凌云壮志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那个双腿高位截肢、依然选择冲锋的倔强身影。

“银河”，这镌刻着理想与光荣的两个字，始终在他心灵的夜空熠熠生辉。

7月29日，王戟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广为传扬，很多人收到了中宣部授予他“时代楷模”称号的短信。

当全网都在搜“王戟是谁”的时候，他本人却平静如初。第二天，他又摇着轮椅出差了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。

鲜花与掌声，从来不是王戟的追求。当初他选择“高可信软件”这一“冷门硬核”赛道时，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功与名。

王戟如此，他的导师陈火旺也是如此。

陈火旺与他的妻子吴明霞都是银河团队成员。他们的儿子陈立曾回忆，1980年高考前夕，班主任到家里对他父母说：抽出时间辅导一下孩子，他就有上大学的希望。然而当时正是“银河”巨型机研制关键阶段，夫妻俩终究没能为他助一臂力，后因儿子高考落榜而感到遗憾。

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选择，却是陈火旺夫妇不得不作出的牺牲。

早在1965年，陈火旺便投身计算机软件研究，在国外进修一年多时间，带回了当时先进的软件技术。但那时，软件在国内还是冷门行业。很多人把1984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成立，看作是软件产业的开端。在此之前，软件只是作为电子工业、计算机产业中的一个小分支。

如果没有甘坐“冷板凳”的定力，就没有后来担任“银河-1”软件系统总负责人的陈火旺，更没有他用毕生心血培养的软件人才队伍。

陈火旺如此，一代代“银河人”亦是如此——眼前的成就有多灿烂，背后坐冷板凳的时光便有多清苦。

“对科技工作者来说，热门或冷门不是选研究方向的标准，国家和军队的需求才是。”王戟的这番感悟，正是“银河精神”薪火相传的历史回响。

王戟至今保留着一个毕业纪念册，上面写着陈火旺的一句赠言：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。”

2013年，王戟住院手术的那几天，

一幕幕场景深深烙印在他母亲的记忆里。一拨又一拨人赶到医院探望，学校领导恳切地对医生说：“他是我们学校 and 军队的宝贝，请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……”

13年来，一双双温暖的手伸向王戟和他的家人：学校为他专门改造生活和工作设施，进行无障碍处理；邻居梁妍经常帮忙照看孩子，社区工作人员一次次帮助解决困难……

王戟感慨道：“我的重生，从来不是孤军奋战，是无数人为我点亮了光。”

关心和尊重科技工作者，是国防科技大学一以贯之践行的优良传统。

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是开国大将陈赓。他常常和学院领导们念叨：学员是“吃饭吃菜”的，教员是“做饭做菜”的，领导是“端盘子”的。

当时住房条件困难，陈赓把一幢最好的楼房作为老教师的宿舍，自己则同一些领导住在院区的一排小平房里。当个别老红军一时难以理解时，他耐心开导：“你有你的长征两万五，他有他的十年寒窗苦。”

后来，陈赓推行“两老办院”，即依靠老干部和老教授办好学院。经过战火考验的将士们，既为科技工作者做好勤务员，又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，共同打造英才辈出的“哈军工”。

照亮王戟心灵的一束束光，也曾照亮过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奋斗终身的科技工作者们，让他们在艰苦岁月感到了温暖。

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屠守锷到晚年仍清晰记得数十年前的一幕。隆冬季节的一天，聂荣臻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，首先看了看科研人员的简陋住处，然后才到会议室。他说：“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，为科学家搞好科研工作的条件，搞好学习和生活条件。”屠守锷说，当时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冷了。

创新之道，唯在得人。习主席一直对科技工作者悉心关怀、寄予厚望。今年7月8日，习主席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、两院院士大会、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：“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，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、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，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。”

国防科研的战场，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王戟说：“传统意义上的战争，我很难去参与了……科技的战争我可以积极地主动地去参与，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。”

强国强军的征程上，我们需要更多像王戟一样“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”，也需要用真诚为他们排忧解难的“勤务员”，使“王戟们”能够安身、安心、安业，让他们幸福地奋斗、热烈地追梦。

诗 话

铁血浮雕

■温 青

青铜的身躯里
蛰伏着一九四〇年的霹雳
八月的雷雨，撕开囚笼
在战旗的指引下
穿越硝烟中破损电裂的华北
当英雄的隊伍发出怒吼
所有侵略者的咽喉
勒出冰冷的恐惧

浮雕已经叠成了山峦
每一道刻痕
都是冲锋陷阵的足迹
钢枪与血肉擦出的火星
在硝烟缝隙中，再次照亮
被弹片反复耕耘的大地

旗帜上的体温
抚过将士们的剑眉
博物馆的寂静早被唤醒了
这些军魂的浮雕啊——
击穿八十多年光阴的距离
永远守护在
一个国度的前沿阵地

硝烟中的灯火

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，苍茫如海，草甸起伏。

两河口会议后，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到达黑水芦花地区，准备继续北上，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。他们派出先头部队进入草地，侦察北进的道路。

侦察任务极其艰苦。红军官兵对草地的情况不明，口粮准备也不足，更艰难的是还要应对突如其来敌人——国民党军马步芳部的两个骑兵团。敌人的骑兵像秃鹫一样盘旋在四周，一旦窥得可乘之机，便挥舞着马刀呼啸而来。

红军擅长在密林和山地展开步兵作战，但缺乏打骑兵的战术训练。激战了一天，红军官兵顽强拼杀，虽然将敌人击退，但损失很大，不得不从草地折回。

在此后的时间里，部队外出侦察、筹粮、联络，屡屡遭到骑兵的袭击。如何战胜敌人的骑兵，成为长征途中亟待解决的问题。红军总部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。1935年8月6日，中革军委颁布了《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》。一时间，红军部队掀起了学习打骑兵战术的热潮。

刘伯承、叶剑英等同志分头到各个部队，向官兵详细讲解同骑兵作战的战术要领，如发现敌人的骑兵后，应沉着、冷静，认真做好战斗准备；要严格估计部队投入战斗所需的时间；占领有利地形，构筑骑兵不能通过的障碍物……战士们围成一圈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
可当时队伍中有很多人识字，文化程度低，战术条文很难一下子记住。这时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想出了一个方法：把战术要领编成简短歌词，教大家唱。《打骑兵歌》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了。

敌人的骑兵不可怕，
沉着应战来打他。
目标又大又好打，
排子枪快放齐射击……

宣传干事李伯钊看到歌词后，不禁拍起手来，随即哼出了熟悉的调子。旋律取自江西苏区老歌《粉碎敌人的乌龟壳》，节奏明快，好听易唱。几分钟后，旁边的战士也会跟着唱了。

歌曲在《红星》报发表后，引起了红军指战员的浓厚兴趣，很快在各个连队传开了。歌曲获得了热烈的反响，激发了李伯钊的创作热情。她又创编了《打骑兵舞》，将战术动作融入其中。歌舞结合，欢快热烈，官兵学习战术的兴致更浓了。

广泛的宣传鼓动和行之有效的战术要领，帮助红军扭转了被动局面。翻越大盘山后，红军官兵消灭了敌两个骑兵团，用缴获的战马成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侦察连。

从普宁英歌到《强军战舞》

■胡旭东

创作谈

俗话说，“北有安塞腰鼓，南有普宁英歌”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普宁英歌，融武术、戏剧、鼓乐为一体，刚劲雄浑、气势震天，被称作“中华战舞”。

歌舞《强军战舞》的创作，是将普宁英歌的传统舞步与军事训练动作有机融合的一次尝试。我们曾专程前往广东普宁，现场观摩普宁英歌的完整展演，内心深受震撼。随后，我们又走进当地文化馆，围坐在老中青三代非遗传承人代表身边，听他们讲英歌的来历，一招一式学习地道的槌法与步法。

越是深入了解，我越是感到英歌的鼓点和军营的号子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。英歌排山倒海的气势，契合官兵一往无前的冲锋姿态；传统战舞铿锵的家国大义，与官兵守卫国土的使命担当，在精神内核上紧紧相连。

创作期间，我反复调整鼓点的轻重、旋律的起伏，让英歌的韵律更加适配军营的气质；编排舞蹈时，我们注重传统文化与军旅元素的结合，让这个流传数百年的战舞，真正走进军营、属于官兵。

当作品成形、鼓点敲响，军营特有的精神气质为这门古老艺术赋予了新的内涵。官兵时而背靠背挥舞战鼓，时而腾挪跳跃气势昂扬，阵形变换间

把战术要领编成歌

长征中诞生的歌曲《打骑兵歌》——

夏紫璇

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刘瑞龙后来回忆，这首歌“寓战术要领于歌曲，情趣盎然，琅琅上口”。红军干部潘振武在著作《战歌春秋》中写道：“《打骑兵歌》的推广普及，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效用。以后红军遇到骑兵，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，一阵排子枪打过去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。”

《打骑兵歌》的传唱，增强了红军官兵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。当一支军队高唱嘹亮的军歌开赴战场时，便已经凝聚起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。

1996年10月21日刊发于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《革命理想高于天——伟大的长征精神永存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红军指战员就是以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嬉笑逆境，迎接并战胜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……过草地时，《打骑兵歌》不胫而走，在红军中广泛流传，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。”

尽思协同默契，对打刺杀时尽展铁血锋芒。官兵的每一个动作，仿佛都带着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命力；每一个舞步，仿佛都踏在了历史与时代交汇的鼓点上。

《强军战舞》的创作过程并非一蹴而就。这两年，从最初兼顾咏叹能与韵律的《砺剑节律操》，到凸显火箭军特色的《砺剑军舞操》，再到融合传统文化的《强军战舞》，我们一步步摸索、一点点沉淀，这一路走得踏实且坚定。

我始终提醒自己，无论形式上如何创新，创作的根永远要扎在基层一线、生长于官兵的生活中。《强军战舞》之所以能够赢得官兵的喜爱，重点在于找到了传统文化与官兵精神世界的连接桥梁。只有精准了解官兵的精神需求，持续探寻军营文化传播规律，我们才能用音符与舞步，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、血性风骨、精神风貌，转化为看得见、听得见、能共鸣的视听语言。



扫码观看歌舞《强军战舞》MV



百团大战 光耀千秋(浮雕,局部,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馆内)

资料图片

百团大战，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。从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，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及地方武装，在华北民众的大力支持下，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0次以上，毙伤日伪军2.5万余人，破坏铁路474公里、公路1502公里。百团大战的胜利，粉碎了日军“囚笼政策”，遏制了国民党内部对日妥协倾向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，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。